

# 建康与六朝江南经济区域的变迁

何德章 (武汉大学历史系)

六朝时期,江南社会经济较之两汉,有了巨大的发展,业已成为共识。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对六朝时期江南各个地区或经济区域的社会经济状况也有了较多的了解<sup>[1]</sup>。在对六朝江南经济区域的研究中,尤以六朝扬州特别是三吴浙东的研究显得最为充分<sup>[2]</sup>,有关六朝经济史论著所举典型材料,绝大多数也都与这一区域有关系。我们从这些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虽然六朝江南各地区社会经济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不平衡,与三吴浙东相比,湘、赣流域等江南腹地还处于待开发的状况,而赣江流域或者说江州经济区又比湘江流域发达。我们在现有的研究论著中确实还找不到湘州经济区的提法,湘江流域只作为荆州经济区的附庸而存在<sup>[3]</sup>。

研究者基于史料表达给我们的上述认识自然是正确的,而且有关六朝以后各个时代江南社会经济的研究论著亦证明,江南后来的开发也正是沿着由江浙到江西再到湖南这一路线梯次进行的<sup>[4]</sup>。六朝江南的开发进程无疑为后来时代江南的开发进程定下了基调。可是,人们却忽视了在两汉以前的两汉时期,江南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却别有一番格局。与六朝时代正好相反,两汉时代,湘江流域是江南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其次为赣江流域,三吴浙东发展最慢。

一般来说,在生态环境较好而人地关系远未达到紧张状态的农业社会,人口数量级与密度及政区建置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两汉时期,湘江流域设有长沙、桂阳、零陵、武陵四郡,该四郡大致与今湖南省的面积相当,面积区域约为21万平方公里;赣江流域设有豫章一郡,大致与今江西省重合,面积约为16万平方公里;在今闽、浙及苏、皖江南部分约28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亦即在六朝江东或研究者称之为扬州经济区的范围

内,长时期设有会稽、丹阳二郡,至东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方分会稽置吴郡。兹据《汉书·地理志》及《后汉书·郡国志》将上述三个两汉时期政区、人口情况列表显示于下。

扬州地区:

		西 汉	东 汉	增长率
会稽	户数	223,308	(含吴郡)287245	29.95%
	口数	1,032,604	(含吴郡)1181978	14.56%
丹阳	户数	107,541	136,518	26.94%
	口数	405,171	630,454	55.55%
总计	户数	330,849	423,763	28.11%
	口数	1,437,775	1,812,432	26.05%

赣江流域:

		西 汉	东 汉	增长率
豫章	户数	67,462	406,496	502.70%
	口数	351,965	1,668,906	374.16%

湘江流域:

		西 汉	东 汉	增长率
桂联	户数	28,119	135,023	380.18%
	口数	156,488	501,403	210.41%
零陵	户数	21,092	212,284	906.46%
	口数	139,378	1,001,578	605.67%
武陵	户数	34,177	46,672	36.82%
	口数	185,758	250,913	36.07%
长沙	户数	43,470	255,854	488.80%
	口数	235,825	1,059,372	349.23%
总计	户数	126,858	649,833	412.25%
	口数	717,449	2,813,266	292.11%

根据上面表列,我们可以看到,两汉时期,江南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为湘江流域的零陵郡,其户数和口数的增长率分别达906.46%、605.67%,其次为赣江南流域的豫章郡,分别达502.70%、374.16%,近似于湘江流域长沙郡(国)的488.80%、349.23%,而包括后来三吴、浙东的

会稽(含吴郡)户口的增长率别只有14.56%、26.94%，比湘江流域增长最慢的武陵郡的36.82%、36.07%还低。由于人口增长慢，西汉时，扬州区的户数和口数别是赣江流域的4.6倍、4.2倍，也分别是湘江流域的2.6倍和2倍；东汉后期，赣江流域的户口数已接近扬州区，而湘江流域的户口数反而远远超出，仅零陵、长沙二郡的户口数便已多于扬州区。如果考虑到我们所说的湘江流域与赣江流域面积都有小于扬州区，那么两汉时期上述三个地区人口变动所引起的各地区人口密度的变化，则更为明显。从西汉到东汉，扬州区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5.4人增至6.5人，赣江流域由2.2人增至10.4人，湘江流域则由3.4人增至13.4人。尽管我们对上述三个区域的面积系根据现在行政区划估计而得，容有误差，但扬州区在西汉时人口密度高于湘、赣流域，而东汉后期大大低于湘、赣流域，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两汉时期，湘江流域增置2县，赣江流域增置了3县，扬州区虽从会稽分出吴郡，但县数无一增加，政府行为无疑是对三个区域人口变动的反映。

有的研究者认为，六朝之始，孙权放弃具有战略意义的武昌而选定建业作为都城，乃“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实为迁就经济中心的扬州”。并分析说：“吴之境内，扬州最为富庶，其中尤以太湖流域的三吴及会稽最为丰沃富实，吴之军国所需，大都有仰赖吴会地区的供应。武昌居于上流，扬州逆水上运，甚为不便，同时孙吴也必须有效地控制其经济命脉，因此最直截的办法就是建都于扬州。”<sup>[5]</sup>事实上，中国古代都城的选择，经济因素往往并不起决定作用。北魏前期都平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均没有选择当时“国之资储”凭借的河北地区为定都之处；唐代定都长安，关中地区并不是当时的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元、明、清以北京为都，更是远离当时的经济中心区域。就六朝之初的情形看，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江南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并不在扬州三吴、会稽，而是在湘江流域的长沙、零陵，孙权不都于处于“北据汉沔，利尽南海”的荆州中心地带的武昌，而居建业，更多还是应从诸葛亮分析孙氏据江东创业且“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这一背景中去考虑。孙权创业时，全柔为桂阳太守，命其子琮运米数千斛到吴郡，“有所市易”<sup>[6]</sup>，即说明当时湘江流域南端的桂阳粮食出产比吴地还

丰富。

着意于三吴浙东开发的研究者对孙吴时这一地区行政建置激增映象尤深，并视之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标志，用以证实吴会财富为孙吴经济命脉的说法。但孙吴同时也在湘、赣流域大规模地分置郡县。孙吴时，扬州区由东汉时的3郡分为8个郡级行政区，属县由40个增至近80个；赣江流域原东汉豫章郡则被分为7个郡级行政区，属县由21个增至58个，郡、县增加的幅度远高于扬州区；湘江流域从零陵分出邵陵、始安二郡，从长沙分出湘东、衡阳二郡，从桂阳分出始兴郡，县的数目亦有很大的增加。因此，孙吴时扬州区行政建置的增加并不能证明该地经济远高于湘、赣流域，为江南经济中心区域。

或许有人会从人文方面提出例证，汉末扬州区已有吴郡已有朱、张、顾、陆四姓，会稽亦有虞、魏、孔、贺，他们特别是吴郡大族在孙吴时俨然为政治支柱，东晋南朝其拥有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影响均不可小觑，何以在经济更为发达的湘江流域并不能找到足以与之抗衡的大族势力呢？我们认为，一个地区人文方面的进步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却不必与经济发展同步，且事实上，汉末湘江流域并非没有可以称道的大族人士。零陵烝阳人刘曜在东汉时官至苍梧太守，其子刘详官至江夏太守，刘详子刘巴在汉末称为“高士”，有名于三方，曹操进兵荆州，辟以为掾，使招徕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巴后投益州，为刘备所得，蜀初代法正为尚书令，刘备称帝，文诰策命皆刘巴所作。刘巴死后，曹魏尚书仆射、士人领袖陈群还致书蜀相诸葛亮，“问巴消息，称曰‘刘君子初’，甚敬重焉”<sup>[7]</sup>。零陵人蒋琬则在诸葛亮死后成为蜀国的中流砥柱。这些事实说明汉代湘士并非没有显赫的大族和才识之士，只是由于他们不如吴姓大族人士那样幸运，在汉末政治变动之际成为一个地方政权所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反而不得不涉蜀地，脱离宗族乡里的依托，难以有重大的发展。而且我们知道，虽然治史者因为吴姓大族后来的影响而对他们在汉代的情况钩稽索引，但仍不能说得十分清楚，吴姓大族人士的社会影响主要还是在孙吴时期形成的，他们在汉代并不比湘士大族人士更有影响力。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已经使我们对汉代湘江流域的物质文明及该地区对中原文化的

吸收程度有了充分的认识,而汉末三国时这一地区的情况或许还要等到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全面整理研究才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尽管孙吴定都建业亦即东晋南朝的建康,并非因为江东当时已是江南政权立国所必须依赖的经济最发达区域,相反,当时江东地区开发程度还不及湘、赣流域,但建康作为六朝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及其规模的扩大,却给六朝江南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最终使两汉时江南经济由中游向下游推进的旧面貌一变为由下游向中游推进的新格局,并由此影响到后来江南开发的历史进程。

首先,政治中心区域优先发展的政策及其对北方流民的吸引。

建康作为六朝政治中心,其所在的扬州地区成为六朝各政权致力于发展的首要地区。六朝时期,由官方进行的对江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陂塘修建、交通道路整治等活动,我们基本上只在扬州市区能见到。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南朝宋时,将长江中游足以与扬州对垒的荆州正式划分为荆、雍、郢、湘数州<sup>[9]</sup>,而经济上的考虑却使南朝统治者压抑住了政治上的试图,浙东五郡最终未能在六朝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sup>[9]</sup>。

六朝时期,北方流民对于南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亦为公论,但我们与其笼而统之地强调北方流民对江南开发的促进作用,还不如说北来流民对扬州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东晋南朝,政治中心所在的扬州市接受北来流民最多。如果说“庇大姓以为客”的下层群众多数还是因为地理的原因,选择最有利的路线南逃至此,支撑东晋政权的百余家士族无疑主要因为政治上的归依而选择了建康,进而卜居于与建康间往来方便,又有山泽可垦以建立家业的浙东。与此相应,能说明北方流民南至赣江流域的史料只有“流人万计,布在江州”一条<sup>[10]</sup>,湘江流域一条也没有。

我们可以举京口、晋陵(今苏南镇江、常州一带)开发的实例,说明政策因素与流民因素在扬州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孙氏创业,曾一度以京口为政治中心,后迁建业,于此地置督,领屯兵且耕且守,又分吴郡无锡以西置毗陵典农校尉,并曾命“诸郡出部伍”,在此集中屯垦,仅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所率前来的便“男女各数万口”<sup>[11]</sup>。

能在这一地区开展屯田,说明这里土旷人稀,而屯田这一政策性的作法无疑能使此地比自然发展得到更快的开发,因而西晋径在吴毗陵典农校尉基础上置晋陵郡。东晋南朝,渡江南下又没有依附大姓为客的北来流民麇集于这一地区,《隋书》卷24《食货志》说:“晋永嘉大乱,……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太元五年,因前秦军队南进,晋“逼徙江淮民,悉令南渡,三州失业,道相望”<sup>[12]</sup>,京口、晋陵一带自然又是“南渡”者主要的接纳地区。东晋初还“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郟、胸、利城三县,而祝其、襄贲等县寄治曲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郟等三县亦寄治于京”<sup>[13]</sup>。南兰陵侨郡亦在此地。京口蔚为江南重镇<sup>[14]</sup>,这一地区成为南朝宋、齐、梁三朝皇室起家之地,均与六朝各政权有意识地发展这一地区及北方流民聚集有关系,从实质上说则是建康作为政治中心的产物。

其次,建康城市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经济上的带动作用。

从孙吴开始,建康城市规模与居民不断增加,梁朝时人口达到28万户140多万人<sup>[15]</sup>，“京师无田”<sup>[16]</sup>,建康作为纯政治性的城市,实际上也是一个消费中心,不仅奢侈品,各种人的衣、食、日用品乃至材草均仰赖其他地方供给,而商业活动是建康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商贾辐聚,“贡使商旅,方舟万计”<sup>[17]</sup>。东晋南朝,一旦发生交通阻碍,贡使不至,商贾不达,建康很快便会陷入经济危机。特别是在南朝宋、齐、梁时,赋税从以实物改为部分以钱币交纳,官员的俸禄也部分以钱币形式支付,官府开支也从官府作坊制作或征调改为和市,更进一步使建康日常生活依赖商业活动而得以维持。往来建康与江汉地区的商业活动竟然孕育出充满商业气息的“西曲”或称“大堤艳曲”<sup>[18]</sup>。

建康作为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商业中心,自然对它所依托的扬州市的经济促动最大,到南朝时,在经济发展特别迅速的地区,商业行为已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刘宋时,为人佣力的会稽永兴人郭世道亦“尝与人于山阴市货物”,其子郭平原佣赁养亲,甚至一度曾“自卖十夫以供众费”,后又种瓜为业而“每出卖物”;会稽永兴一个村子因大雪,“商旅断行”而“比室饥饿”<sup>[19]</sup>。乡村百姓的日常生活

竟依赖商业,我们关于南朝盛时商业对吴会地区社会经济影响深度与广度的估量或许还不够充分。孙吴曾将浙东、皖南乃至闽北山地的居民大量迁往其易于控制的地区屯垦,开发易于开垦的土地,而南朝宋、齐、梁时,上述山区以屯、传、邸、冶为形式的开发利用发展迅猛,这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商业利益驱动的结果,这些地区因人口增长自然产生的开发热情并不是主要因素。建康作为商业中心所具有的带动作用,对赣江流域也有相当的影响。东晋末,卢循部属徐道覆据始兴郡,“密欲装舟舰,乃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伪云下都货之”<sup>[20]</sup>;陈初,临川周迪欲袭江州刺史华皎于湓城,而袭吕蒙“白衣过江”故伎,“遣其兄子伏甲于船中,伪称贾人”而往<sup>[21]</sup>。这两件政治轶事的产生,须以赣江上频繁的商业活动为基础,赣江上的商业活动,其汇聚地还是建康。

商业的繁荣虽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却能改变其覆盖地区人们的生产行为,促使这些地区改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为追求更多利益而进行生产。六朝以建康为中心的商业活动逐渐将扬州乃至赣江流域的经济带动起来,使之摆脱了汉代凭借自然条件优越,“窳偷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的纯自然经济状态<sup>[22]</sup>,《隋书》卷31《地理志下》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以建康为中心的商业网络:“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亦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辐凑。……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于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新安、永嘉、建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我们注意到,湘江流域处于这一商业网络之外,也就是说,六朝建康发展日益增强的经济带动力量,未能作用于更遥远的湘江流域。

再次,主要交通路线的改变与湘江流域的边缘化。

两汉时代,整个江南地区都处于政治、经济中心区域的边缘地带,而湘、赣流域尤其是湘江流域处于中心区到岭南的交通要路上,与中心区的政

治经济联系却相对紧密。秦朝进取岭南,分置郡县,所建造的沟通中原与岭南的伟大工程灵渠,便是在零陵郡境内的湘江最南端开凿岭峽,连结漓水,从而形成中原经荆襄到湘江以达岭南的交通干道。两汉时期,虽说从长沙、豫章往岭南“水道多绝,难行”<sup>[23]</sup>。但仍不得不利用这两条干道并加以整治,汉武帝时,因南越背汉,“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其中,“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淮]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濞]将军,或下漓水,或抵苍梧”<sup>[24]</sup>。东汉建初八年,大司农郑弘因“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险阻,沉溺相系”,“奏开零陵、桂阳峽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sup>[25]</sup>。西晋统一后,仍对经湘江往岭南的这条道路颇为关注。《晋书》卷34《杜预传》:“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两汉时代湘江流域处于连结政治经济中心区域与岭南的交通干线上,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湘江流域特别是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吴及东晋南朝都于建康,使扬州一带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区域,而湘江流域则沦为边缘地区,六朝尤其是孙吴统治者不容许浙、赣及皖南山区的山越或山民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对蛮族在湘江流域的流布却基本上听之任之,非公开反抗,一般不加干涉,致使湘江流域的社会文化出现蛮族化的趋势<sup>[26]</sup>。通往岭南的交通路线的改变,也是促使湘江流域边缘化的重要因素。六朝时期,岭南社会经济比汉代有了长足的进步,立国形势也促使六朝各政权注意对岭南的控制,并加强与东南亚乃至更远地区的海上贸易与政治往来。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加上建康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建康与岭南及南海的交通可以通过海道及江路进行,至少在南齐时,建康附近便有“崑崙舶”从事交易活动<sup>[27]</sup>。但建康与居南海贸易中心的广州之间,最活跃的交通线路还是从广州经始兴(今广东韶关)沿赣江这条道路,东晋南朝建康与岭南间公私往来大都循此路线,处于这条要道上的始兴因此迅速发展起来。梁末,始兴及赣江流域的豪族政

治上极为活跃,这与赣江作为交通要道,经济发展得到外在的刺激,应该有一定的关系<sup>[28]</sup>。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统一以后,政治中心区域虽再一次移到北方,但政治中心区与岭南的交通干线并没有转向湘江这一线路上来,北方人士因公私前往岭南,多由长安、洛阳转运河南下至扬州或江宁(即建康),再溯江而上经赣江以往,从岭南北返大都也遵循此道。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区域的背离影响了交通线路,而湘江流域在六朝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边缘区域的地位也因此长期存在下去。

总之,作为农业社会,湘、赣流域与扬州市在地理条件上并无太大的差异,如果没有以江南为统治区域的六朝政权的出现,或者六朝没有选择建康而是选择中游某地建都,江南开发的格局会按两汉业已形成的由长江中游的湘江流域向下游的扬州市推进的格局进一步发展。可以说,六朝政权的出现,给江南的开发以前所未有的推动,而六朝政权定都建康,建康城市规模的扩大及其经济生活对商业活动的依赖,又引起江南经济区域的巨大变迁,由下游向中游逐步发展遂成定局。

- [1]从整体上划分六朝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区域并论述其经济发展状况的论文主要有许辉《论六朝时期长江经济的整体开发》(《江海学刊》1992年第4期)及傅兆君《六朝城市经济的特点及其在新经济区发展中的作用》(《学术月刊》1992年第11期)。
- [2]关于六朝浙东社会经济状况,比较集中的研究见王志邦《六朝江东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
- [3]许辉、蒋福亚主编:《六朝经济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所述六朝经济区可作为代表,他们认为除巴蜀、江汉、三吴三个大型经济区外,豫章、岭南、闽江三个新经济区也初具规模,湘江流域即被置于所谓江汉经济区之中。
- [4]有关研究见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收于氏著《长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韩茂利《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 [5]刘淑芬:《建康与六朝历史的发展》,见其《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8~9页,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出版。
- [6]《三国志》卷60《全琮传》。

- [7]《三国志》卷39《刘巴传》及该传裴注。
- [8]参拙撰《释“荆州素畏襄阳人”》,收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于经济因素反对分割扬州的意见可参《宋书》卷66《何尚之传》。
- [9]关于刘宋时三度分扬州置东扬州或会州,见《宋书》卷99《二凶传》、卷35《州郡一》“扬州”条,其间种种政治纠葛,拟以专文论述。
- [10]《晋书》卷81《刘胤传》。
- [11]《宋书》卷35《州郡一》“扬州·晋陵太守”条及《三国志》卷52《诸葛瑾传》裴注引《吴书》。
- [12]《宋书》卷33《五行志四》。
- [13]《宋书》卷35《州郡一》“南徐州·南东海太守”条。
- [14]关于东晋时期京口重镇的形成及其政治、军事作用,详参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74~101页“郗鉴与京口的经营”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 [15]《太平寰宇记》卷90引《金陵记》称:“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东西南北四十里。”这一记载引起过一些研究者的怀疑,但得到严耕望先生的支持,见于氏著《南北朝三个都城人口数量之估测》一文,载《新史学》第1卷第2期。
- [16]《宋书》卷54《孔季恭传附弟灵符传》记宋江夏王刘义恭反对孔灵符徙山阴无地之民于他处耕垦说:“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
- [17]《宋书》卷33《五行志四》“水不润下·晋安帝元兴二年”条。
- [18]参王运熙:《吴声西曲的产生地域》,收于氏著《乐府诗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五编第二章“西曲歌”一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30~242页;严耕望:《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收于氏著《唐代交通图考》第4卷。
- [19]《南史》卷73《孝义传上》。
- [20]《晋书》卷100《卢循传》。
- [21]《陈书》卷20《华皎传》。
- [22]《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 [23]《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 [24]《史记》卷113《南越列传》。引文校勘参阅唐兆民《灵渠文献粹编》第144页,中华书局1982年。
- [25]《后汉书》卷33《郑弘传》。
- [26]《隋书》卷31《地理志下》。
- [27]《南齐书》卷31《荀伯玉传》称齐武帝萧贲为太子时,“专断用事,颇不如法”,其所宠任的张景真“度丝锦与赬蛇舶营货,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
- [28]拙撰:《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